

·城乡发展与社会治理·

服务与治理互构： 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新走向

姚进忠 陈海萍

摘要：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对其专业职能的多维呈现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在应对新兴议题时日益凸显解释力与实践力的局限。立足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与治理语境，新时期“服务+治理”双重使命下的社会工作职责可系统整合为五个关键职能维度：人群帮扶的专业作为、基层治理的专业参与、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党建引领的专业助力。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境中，社会工作理论的创新发展亟须回应一个根本命题：社会工作如何在“服务”与“治理”双重实践中实现价值契合与行动统一？唯有清晰解答这一问题，方能推动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肩负新使命、彰显新作为。理论的建构必须兼顾历史纵深与现实需求，统筹全球视野与本土根基，以“立足文化、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广阔格局，打造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自主知识体系。基于“服务”与“治理”互构共生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自主发展可从三重路径推进：其一，立足历史视角，发展具有历史厚度的自觉理论；其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建构富有文化根基的自觉理论；其三，系统提炼新时代社会工作实践成果，创新体现实践导向的自觉理论。

关键词：社会工作；服务；治理；理论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的重要基石，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和革新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长期以来，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专业宗旨，致力于运用科学、专业的服务方式协助个人与社会摆脱困境。因此，社会工作理论始终围绕两个关键问题展开探索与阐释：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困境如何形成；二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如何操作和开展。常见的社会工作理论类型主要包括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①纵观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史，无论强调宏观倡导还是着眼微观介入，对上述两大问题的探讨均聚焦于“服务”：服务从何而起？服务如何设计？服务何以有效？服务如何持续？由此，社会工作理论长期以来更为关注个体问题的化解，将其关怀投射在个体身上，具有明显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服务特质。这种基于个体主义与专业分工的经典理论范式，在应对强调“家国同构”“情理法”交融的中国社会情境与治理需求时，显露其解释边界；而构建兼具文化自觉与实践效能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则亟待超越单纯的服务技术逻辑，迈向“服

收稿日期：2025-1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5&ZD266)

作者简介：姚进忠，集美大学社会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0)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实务、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陈海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健康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研究。

① 张威、陈曦明：“基础能力”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2021年第5期，第1—27+101—102页。

务”与“治理”互构的整体性视野。^①然而,随着现代性从“固体”阶段向“流动”阶段过渡,社会被视为一个包含各种随意性的联结和分离的矩阵,潜藏着无数可能出现的排列结合方式。长期性的思考、计划及行动日渐崩溃,社会形态快速变迁使得人们可参照的生活策略框架变得日益模糊、没有定势,而解决由此而生的各种困境之责却落到了个体身上。^②生活世界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让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不安与恐惧。^③这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状态表明,传统聚焦于个人适应与问题化解的服务模式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时存在局限;而要构筑一个能够为个体提供稳定持久和支持性的生活环境就必须从社会整体进行协调与整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亟须进一步深思: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构建一个能更好地服务个体的生活世界?正因如此,社会治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核心目标在于“努力实现社会连结与社会团结的互动共生和良性循环,以期构建一个兼有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社会”^④。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的责任。”^⑤这一论述从政治高度确立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专业力量,新时期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领域、内容、模式等方面都有所拓展,其内涵与外延亦随之深化与拓宽。特别是在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中国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功能被赋予了更具治理思维。立足于这一战略定位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职能呈现出双重面向:除了要通过“服务”解决具体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更需依托“治理”去构建一个安全可信的和谐社会。尽管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涵盖了“治理”议题,但仍难以阐释并回应当前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多元治理需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已呈现出明显的“服务-治理”双重面向。社会工作通过党建引领、行政支持与专业整合,不仅提供精准服务,还参与构建多主体共治生态,体现出回归“人”的治理理念。^⑥这表明,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已超越西方以服务为导向的单一范式,亟待理论上的系统提炼与阐释。因此,如何立足中国本土情境,在“服务”与“治理”互构的实践框架中,建构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已成为推动当前社会工作理论发展和革新的重要任务。

二、个体问题消解的关注: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表达

“社会工作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的福祉,帮助人们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弱势中的人们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它同时关注提升社会生活中个人的福祉和整个社会的福祉”^⑦。为实现这一宏大的专业使命,社会工作首先要在其发展初期确立起坚实的专业身份。社会工作早期理论建构的核心正是围绕着“何以以及如何成为一门专业”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以推进自身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为此,社会工作选择对标医学与心理学这两大已确立的科学专业,致力于在系统理论、科学方法和伦理规范等专业化要素上达成业内标准共识,以逐步合法化其科学的专业身份。社会工作理论的早

① 王思斌:《促进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发展》,《中国社会工作》2025年第34期,第6页。

②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第67—68页。

④ 冯仕政:《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页。

⑤ 《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第1版。

⑥ 徐选国、秦莲:《回归“人”的治理:社会工作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构建的内在逻辑》,《社会政策研究》2025年第4期,第60—72页。

⑦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 Code of Ethics*,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1996.

期书写和传统表达始终沿着“是何问题、为何产生、如何解决、何以有效”这一逻辑思路铺陈开来,旨在厘清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和需求,阐释解决其问题和需求的介入过程以及运用的专业技术。弗朗西斯·特纳(Francis Turner)将这样的理论称为以服务为导向(service-oriented)的理论。^①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主要关注社会工作者如何能够有效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为社会工作者在具体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提供一个基本的实践逻辑框架。这一理论取向将早期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与具体实践紧密相连,使得以服务为导向的理论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伴随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社会工作实践的演进,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亦呈现了多元化的样态。依据实践切入点的不同,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大致可分为三大流派:病理学实践、社会与结构实践和生态增能实践。^②在各个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中,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都涵盖了以下三个关切点。

(一)如何评估服务需求

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的需要如何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对服务需要的评估自然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起点。在此前提下,不同流派理论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服务对象的需要进行评估、分析和解读。尽管社会工作开创者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都强调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要立足服务对象的常态化生活,但为了向外界证明自身是一门严谨的专业,早期的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在“专业化的自我证明”过程中,仍不自觉地导向了医学诊断模式。^③初期的社会工作理论将服务对象的需求视为问题和缺陷,具有较强的病理学思维,遵循了医学诊断框架对相关“治疗术”进行梳理和书写,假设了有效干预的前提是精准的需求把脉。这种视角倾向于从个人病理层面寻找社会问题根源,由此病理学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大多使用医学模式对人类行为进行诊断和干预,它们的许多概念主要用来识别疾病及其成因。这些理论形成了一系列诸如动态诊断、缘由诊断、分类诊断等操作性概念供社会工作实践运用。^④基于病理学实践的服务需求评估更多的是对个体的剖析和诊断,锚定个人背景特质与能力不足的问题成因。这种将复杂社会问题个人化、疾病化的倾向导致了对其结构性根源的忽视,并可能带来对服务对象的“污名化”。^⑤由此,社会与结构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试图找回个体置身其中的“社会”面向,强调从社会环境层面入手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这一理论认为服务需求评估应该兼顾环境和个体,同时考虑个体内在的认知偏差(如内化压迫)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以及所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限制。顾名思义,社会与结构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假设个体的问题和需求是在社会结构的脉络中产生的。^⑥因此,其评估的核心在于揭示权力不平等、社会排斥和制度性歧视如何共同制造了服务对象的困境。生态增能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以一种全人的视角看待服务对象,它并非对前两种视角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旨在整合“个人-环境”二元对立的系统性框架。其标志性概念是“人在情境中”,主张以一种更加

① Turner, Francis,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etical Base," *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19th ed), edited by Richard Edwards,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1997, pp.2248-2265.

② 姚进忠:《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19页。

③ Richmond, Mary, *Social Diagnosi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7, p.25.

④ Perlman, Fredric and Jerrold Brandell,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linical Social Work* (2nd ed), edited by Jerrold Brandel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10, pp.41-80.

⑤ 王磊、张一舟:《残疾模式:残疾研究的理论、政策与福利框架》,《残疾人研究》2018年第2期,第30—36页。

⑥ 姚进忠:《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19页。

生态立体的视野把握服务对象的需求。该流派深受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影响,强调个人与家庭、社区、文化等多层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与适配。它凸显了服务对象对“个人自主”和“社会改革”的追求,在评估中尤其注重发掘服务对象及其环境中的优势、资源和潜能,而非仅仅聚焦于问题和缺陷。不难看出,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始于从多个角度寻找解释服务对象生活存在障碍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服务干预提供方向。总体而言,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致力于追求服务需求评估的标准化以彰显其科学性。

(二)服务计划如何设计

服务计划如何设计是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关切的第二个关键议题。不同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从不同的切入点设计服务计划。病理学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采取主客二分理解模式,致力于提供相对全面、简单和可靠的干预原则,为社会工作服务计划的设计提供学理上的依据。这些理论以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设计服务方案,从服务对象的症状表现入手,常常聚焦于服务对象的过去,分析其过往的经历如何影响和形塑了现在的自我,并把这些源自过去的影响因素挖掘出来以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干预。^①病理学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注重以一种线性的思维进行服务方案的设计,并且强调心理动力层面的技术化运用。社会与结构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在设计服务干预策略时,一方面通过批判意识觉醒与倡导集体行动,增强服务对象对其所处社会结构的主控权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政策分析与参与式倡导等路径,致力于改革服务机制、政府政策与宏观体制,以积极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②在这一理论流派中,服务计划的设计既凸显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联结以构建支持联盟的重要性,又强调通过改变社会政策来保障社会福利体系与服务输送网络的畅通与公正。生态增能实践流派的社会工作理论在阐释服务计划时,以“人在情境中”为核心框架,关注服务对象及其生活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其计划是一个旨在提升“人-环境”适配度的动态过程,通过链接资源、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系统间的对话等方式,帮助服务对象以一种更具整体性、更有全局观的视野,系统性提升其自我探索、联结他者、影响社会的能力。^③社会工作理论致力于深入理解人群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针对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干预策略。

(三)个体问题如何解决

在评估服务需求和设计服务计划后,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进一步关注的是服务对象的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无论是病理学实践层面的临床干预、社会与结构实践层面的社会变革,还是生态增能实践层面的双重关注,这些理论均包含了一个深层预设:个人问题与困扰的根源在于“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失衡。因此,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通过恢复或提升二者之间的适配性来解决个体问题——无论是通过改变个人以适应环境,还是通过调整环境以回应个人需求。基于此,服务对象的环境适应能力水平,便成为衡量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成效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常常从这一能力角度出发,理解、阐释并处理个体在改善社会关系和调整生活关系方面的需求。同时,这些理论旨在探索个体问题的解决途径,并构建一个以环境适应功能提升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框架。在这样的服务情境中,以服务为导向

① Payne, Martin, *Narrative Therapy: Introduction for Counselors*, London: Sage, 2000, pp.19-20.

② Fook, Janis, *Radical Social Casework: A Theory of Practic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3; Longres, John, “Radical Social Work: Is There a Future?” *Future Issue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edited by Paul Raffoul and Aaron McNeece,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1996, pp.229-238; Payne, Malcolm, *Modern Social Wor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③ 姚进忠:《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19页。

的社会工作实践显然要以环境适应能力不足的困弱群体的需求为出发点,致力于为这些群体提供专业帮扶服务。^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既关注个体也关注环境,但它们大多在实际操作中将个体与外部的环境割裂开来,其关注的焦点往往更多地落在如何通过不同层面的服务消解个体问题,根本目的仍是促进个体对环境的适应。

从早期的专业性自我证明到专业的社会性回归,再到专业的政治性响应,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始终围绕服务对象的需求展开,致力于阐释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实施路径。受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影响,我国社会工作也基本沿着这一思路推进与发展。例如,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往往以服务对象的人群属性为主要划分依据。借鉴西方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理论,我国社会工作长期聚焦于本土服务的精细化实践,强调专业服务技术的有效运用,着力提升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的专业性,以期能够切实回应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在服务内容方面,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重点集中于对困弱群体的关爱和扶助,即便涉及宏观层面的倡导和干预,也仍以提升人群福祉为核心目标。服务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书写和表达实质上是以一种服务对象问题解决的精专业化逻辑而进行的机制提炼与知识生产过程,主要聚焦于福利服务和微观治理,以促进个体对社会的适应。西方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并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为其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然而,受社会经济、文化价值、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方以服务为导向的理论思维使我国社会工作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专业化程度不足的困境,难以充分回应中国社会对专业服务的需求和期望,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举国上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自主理论知识体系就显得尤为迫切。

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治理内涵及实践向度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该方案通过部门职能转隶的方式,成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通过整合部门职能,从体制上实现了对社会领域治理工作的统筹推进与统一领导。随后,在2024年11月初的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为我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顶层设计清晰地表明,我国社会工作正在向“大社会工作”的方向发展和转型。^②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在持续深化专业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服务+治理”的双重功能。依据社会工作部的职责定位,新时代社会工作服务治理走向呈现新作为的实践向度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 人群帮扶的专业作为

社会工作者始终致力于提升人口中最脆弱群体的生活质量。对弱势人群的帮扶与服务是社会工作服务彰显其专业性的重要面向。传统的对社会工作服务帮扶人群的界定主要涵盖两类:一类是依据生命周期和身体特征来界定的,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等;另一类是按照社会融合与社会参与状态来界定的,如戒毒人员、矫正人员、失独家庭等。这些群体依然是新时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对象。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以平台用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这些群体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职业认同与社会融入等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新型脆弱性问题,成为具有时代特

① 童敏:《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实践逻辑与专业社会工作转型》,《社会建设》2025年第1期,第3—23页。

② 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统合性发展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205—214页。

征的潜在弱势人群。^①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社会工作服务需要将服务场域延伸至这些新兴领域,通过构建支持性社群、推动职业健康与权益倡导、链接定制化公共服务等专业方法,以回应新时代我国社会对社会工作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应当在继承传统服务贴近群众、回应需求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专业深化,增强服务能力。社会工作在人群帮扶这一维度的专业作为应是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内容,不仅能够充分展现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运用,而且能够有效破解基层社会问题,为推动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层治理的专业参与

作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关键力量,社会工作服务不仅承载着服务个体、纾解困境的使命,更应成为重塑治理逻辑、激活基层活力的重要引擎。这一进程的核心,是从传统的被动维稳向现代化的“风险转化”演进,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均从这一角度出发——即不再局限于事后补救,而是通过提升个体、家庭和共同体的社会适应力来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②在方法论上,社会工作服务强调以生态的角度去协助构建一种集治疗、预防和发展于一体的基层治理机制。其专业功能在其中不断得到增强:从早期主要通过服务特殊群体、展现精准的专业治理的作用,随后逐步扩展至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等更广泛的实践领域。^③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通过行政导向和问题导向两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机制。

在行政导向的治理过程中,强调协同,推动服务与治理制度的融合,社会工作服务应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社会工作者在理解政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目标基础上,将专业服务传递给服务对象,并在服务过程中体察社情民意,反馈民众意见。^④社会工作服务在实践过程中以专业思维推进治理优化,一方面解决底线性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协助建构基层治理设计。在问题导向的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则聚焦民众的基本需求和基层矛盾,通过提供专业服务直接回应具体社会问题。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具体社会问题,满足了人民需求,而且成为社会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并发挥作用的關鍵切入点。以项目化、专业化服务为着力点,将服务过程转化为治理契机。通过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引领“服务即治理”的实践转型,致力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新生态。

(三)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

当前社会的一个关键矛盾在于:尽管世界日益呈现出更具流动性和多极性的特征,却并未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反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面对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重建社会整合机制显得尤为迫切。这要求社会工作服务在回应群体性需求的同时,协调局部的人群关系,满足区域性发展需要,预防更大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从而促成区域环境的优化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类服务关注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以及居民主动参与能力的提升。^⑤

通常而言,社会工作服务开展区域服务的内容往往与区域化党建的要求高度契合,从区域人群的日常生活场景出发,注重引导个体参与,促进人群互动,提升区域群众的日常交往与生态改善的主体能力。同时强调在特定地理区域(如街道、社区、园区、商圈、楼宇等)或功能区域内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工作新格局。显然,这一维度的服务实践

① 卫小将、石娟:《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第22—32页。

② 芦恒、胡真一:《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韧性逻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9—18页。

③ 王思斌:《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30—37页。

④ 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及其贡献——对服务型治理的再理解》,《社会治理》2015年第1期,第49—57页。

⑤ 童敏:《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实践逻辑与专业社会工作转型》,《社会建设》2025年第1期,第3—23页。

既重视个体的改变与成长,也关注环境的优化与改善,以人与环境的双向关照为核心,实现在日常生活中为个体提供精准服务。社会工作区域服务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对“附近”的生态优化协助个体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以缓解现代化带给个体的困扰和冲击。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使社会工作服务不仅能够适应社会结构新的转型发展,而且能够激发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修复和联结人群关系,推动区域良好生态的建构,最终助力个体的整全成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党引导和动员人民群众贡献智慧与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奋斗目标的生动实践。在我国,志愿服务不仅彰显了自发性和自主性,更承载着关键的治理职能,贯穿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居民自治等多个层面。^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已成为新时代志愿服务的重要导向,正赋能志愿服务提质增效。社会工作在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中主要发挥以下四个作用。其一,指导并协助志愿组织精准把握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需引导志愿者深入群众,运用专业方法开展需求评估,为志愿服务方向提供精准支撑。其二,指导并协助志愿组织设计适配的服务项目。社会工作者可为志愿者提供专业的项目设计培训与督导服务,协助其打造既契合志愿组织能力又有效响应社会需求的適切服务项目。其三,为志愿服务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督导。社会工作者可在志愿服务项目推进过程中及时跟进,提供有效督导,协助处理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与困难,把握好项目推进方向,确保服务得以有效实施。其四,协助志愿组织总结服务机制与打造服务品牌。社会工作者可凭借专业知识,指导志愿组织总结出服务运作的有效机制,助力打造具有标识性的服务品牌,深化志愿服务标准化、品牌化、项目化、专业化建设,从而提升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与可持续性。

(五)党建引领的专业助力

社会工作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确保社会工作服务正确的政治方向。新时代社会工作服务应积极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以精准化、专业化服务助力党建引领实实在在落地。社会工作服务依托党建引领提供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党建在价值联结与组织联结层面的短板,实现服务与治理的互构,用专业的手法助力“让党建引领实实在在让群众感知”,以有效地融入现代化治理体系。具体而言,社会工作服务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效助力党建引领“可视可感”。首先,在价值整合方面,社会工作服务以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关系建立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党的群众路线的实施。社会工作服务中“人在情境中”“服务对象自决”等服务理念与党始终将群众利益置于首位的发展思想高度一致——党的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回应群众所需。由此,社会工作服务通过专业化地调研民情,常态化地倾听民意,组织发动群众参与,将党的关怀转化为具象化、人性化的服务供给,从而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可与情感认同,破解“认同困境”。其次,在组织协同层面,社会工作服务对于基层民间组织建设的助力,能有效地同基层党组织实现联合。党建需要吸纳并培育专业力量,而社会工作服务擅长运用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将原子化的个体组织起来,构建互助支持网络。^②例如,通过组建“家长互助联盟”“儿童成长小组”等,社会工作服务能协助基层党组织将服务对象转化为有组织的社区力量,把党组织建在服务群众的组织之中,借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力提升公信力与凝聚力,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

① 黄晓星:《制度联结: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多重实践与逻辑》,《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第131—143页。

② 童敏:《我国社会结构新特征与社会工作体系建设》,《人民论坛》2025年第10期,第22—25页。

成为做好党的社会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最后,在项目化运作层面,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思维与系统性服务思维,能有效地将党建服务的项目落地与长效运行。社会工作服务强调项目的“系统性-专业性-适配性”,能够将党建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服务具体的民生需求有机结合,设计出目标清晰、流程规范、可评估、可持续的服务项目。这有助于推动党建服务可持续性发展,可以有效规避“一次性”和“运动式”的服务,实现党建与民生同频共振,长效惠民。

四、基于服务与治理互构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工作以“服务”为导向的价值、知识和技术为我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党情和社情,我国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不能简单照搬和复制西方模式,应当注重本土实践的提炼反思,加强本土理论的创新发展,逐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以助力推动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与西方社会工作(social work)聚焦“服务”的单线实践逻辑不同,我国社会工作(society work)立足党的全面领导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更为强调“服务”与“治理”互构的双重实践逻辑。“服务与治理互构”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从中国特定的“地缘”位置出发,对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进行再定位:社会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既要为广大民众提供兜底性和发展性服务,又要让广大民众参与服务型和社会性治理,还要使“服务”与“治理”两类实践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协同开展,以一种“家国一体、身国同构”的本土思维逐步拓宽我国社会工作的职能范畴,从而助力实现“为民”和“安邦”互嵌一体的综融目标。

因此,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职能范畴不仅涵盖针对弱势群体的专业帮扶与服务,而且注重参与社会领域的基层治理工作,着力发挥出社会工作“情理并重”的纽带作用,动员和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①相应地,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需要突破西方以服务弱势群体为核心的传统理念,在“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治理”元素,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民众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社会工作服务场域中。“服务与治理互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人在环境中”的核心预设。“人在环境中”强调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促进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协助个人和社会摆脱困境。这显然暗含了“个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的理论预设,而西方社会工作正是基于这一假设,从个人端与社会端双管齐下开展专业服务,并且对社会端结构性挑战的应对和变革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回应个人端的问题和需求。但是,我国“家国一体、身国同构”的文化传统注重的是“为民”和“安邦”互嵌一体的整体主义精神,因而“服务与治理互构”背后的理论预设其实已经与西方的“人在环境中”有所不同了,它更强调的是“个体与环境之间存在根本一致性”。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一致性使得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革新必然要由传统的“服务”逻辑转向“服务与治理互构”双重实践。

基于“服务与治理互构”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社会工作实践中“服务”与“治理”的概念内涵、目标定位、职能范畴和所涉主体;二是如何解释社会工作实践中“服务”与“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三是如何总结和提炼社会工作实践中“服务”与“治理”的协同机制、行动路径和关键技术;四是如何阐释“服务与治理互构”所指向的

^① Chen, Haiping. "Social Work in China's Mainlan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Vol. 51, No. 1, 2025, pp.279-283.

中国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当我们从“服务与治理互构”的视角挑战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并重新审视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时,许多源自西方的概念命题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正和拓展,而许多来自本土的经验事实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提炼。总之,循着“服务与治理互构”的逻辑,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需要清楚回答社会工作为何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语境中开展“服务”与“治理”的双重实践,从而推动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时代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仅停留于经验的总结提炼,而应该回到自身文明的基本命题中来完成。^①本文尝试从历史自觉、文化自觉和实践自觉三个维度,探讨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和自主拓展。

(一)立足历史视角,深耕本土经验,发展具有历史厚度的自觉理论

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故应以“我”作为出发点,立足历史视角,对来自“他者”和“自身”的理论展开自觉的分析和批判性的反思,并扎根中国本土实际有意识地推进社会工作理论的自主发展。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与建构置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与专业互构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这一过程并非线性的专业移植,而是在“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与“专业本土化的探索实践”之间持续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以来,在“教育先行”的学科建设理念的驱动下,我国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积极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并结合中国本土实际逐步地奠定起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石。在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内研究界和实务界致力于探索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希望能够基于中国本土情境反思并探讨西方理论知识的适切性和局限性。但由于改革开放后弱势群体帮扶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分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社会工作以“服务”为导向的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因而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跳出西方的理论建构框架,主要关注与弱势群体帮扶相关的各种解释性和干预性知识。这种“需求驱动”的路径依赖,也使得中国本土理论建设在源头处便深嵌了西方个体主义与技术理性的基因,为其日后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水土不服”埋下了伏笔。

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大抓基层”导向的不断明确,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与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的中国社会工作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历史转向”,即从传统的“帮扶”逻辑转向积极参与的“治理”逻辑,这种转向要求理论建设必须回应基层社会的复杂现实。^②但是,基于上述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问题日益凸显,其以“服务”为导向的理论思维具有鲜明的问题解决取向、浓重的技术理性色彩、明确的专业服务边界,因此当它们用于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可能导致问题解决虽具即时性但前瞻性不足,服务过程虽大多能合“理”但有时难合“情”,服务供给虽有专业场域的边界感但缺乏日常生活的渗透性。例如,如何调和西方的专业伦理与中国的人情伦理之间的冲突是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经常遇到的难题。^③由此,中国社会工作步入了关键的“历史三峡”,其核心任务是从辅助社会稳定的“技术帮手”,转变为参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专业基建”。^④这一转变远非简单的服务内容叠加,而是专业身份、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的深刻重构。

① 梁永佳:《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0页。

② 王思斌:《社会工作的广域弥散性与协同治理路径》,《中国社会工作》2025年第16期,第6页。

③ 赵万林:《社会工作服务中专业伦理与人情伦理的调适——以一个灾后重建服务项目为例》,《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2期,第67—89+227—228页。

④ 童敏、李诗雨:《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社会工作》2024年第3期,第1—24+151—153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日益多样,服务需求更加多元,服务场景不断延展,尤其在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内容更为丰富,已经成为“面向最广泛的社会领域、最广阔的基层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开展的工作”^①。在此历史关口,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构调整实践,它从顶层设计上终结了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之间的摇摆状态,为其设定了“服务与治理互构”的新的历史坐标。在这一现实情境下,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和拓展需要在以“服务”为专业底色的基础上融入“治理”的中国叙事,从而助力推动我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与以往国内学界经常讨论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本土化问题略有不同,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倡导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建构更为强调本土内生的“原创性知识”而非西学内化的“移植性知识”。这一建构过程尤其需要从“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丰富实践中进行提炼与审视,并关注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在中国的情境与土壤中,本就蕴藏着深厚的专业智慧。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独特的文化脉络与生活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源泉。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本土语境与经验研究中,与西方理论展开一场平等的、创造性的对话。^②

除了提炼诸如“情理法”平衡等蕴含本土智慧的操作系理论,我们还要善于在细微的服务中发掘治理的叙事,在宏观的治理中感知服务的温度。当前社会的快速变迁,有时会让我们不自觉地聚焦于宏大命题,而忽略了那些真正承载政策温度与人文关怀的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实践。正是一次次具体的服务,承载着宏观政策落地时的民生温度,这正是“中国故事”最生动的注脚。^③正是通过倾心聆听并讲述这些故事,从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理论知识,逐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更是为了以自信的姿态,与全球社会工作学界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为世界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④因此,作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社会工作理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既要以古为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要与时俱进,在社会工作动态实践中创新理论;还要面向未来,在社会工作理论更迭中推进变革。

基于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与“治理”互构的双重实践逻辑,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或许可以遵循“服务”与“治理”嵌套的理论书写逻辑,在服务维度上,深入阐述如何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伦理,有效拓展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及时有效化解中国人在现代性社会中遭遇的各种生存和发展困境;在治理维度上,应着力探讨专业实践如何有效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广泛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共建共享美好和谐的社会生活。借鉴冯仕政提出的“社会”的二重性观点^⑤,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和拓展或许也可循着“小社会”和“大社会”的不同生活图景,既在“服务”层面回应“角落里”的“小治理”议题,也在“治理”层面拓展“连接处”的“大治理”效能,从而促使我国社会工作理论在“以服务推进治理效能,以治理巩固服务效果”的互构实践中逐步超越西方社会工作“扶助弱势”的思维定式,以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如何助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及其催生的新的服务实践情境中,发展理论自觉的本土社会工作理

① 丁元竹:《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的新担当与新作为》,《人民论坛》2025年第10期,第26页。

② 梁永佳:《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0页。

③ 高丽、徐选国:《从技术移植到本土融合: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实践的情境变迁及其深层意涵》,《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148—160页。

④ 梁永佳:《为什么要用中国古代思想释译域外世界》,《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22—29页。

⑤ 冯仕政:《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22页。

论需要以作为“场域”的时代为观照,捕捉社会结构变迁的脉搏;以作为“他者”的世界为观照,在全球视野中确立自身坐标;更要以作为“自身”的中国为观照,自觉地以一种批判反思、交互观照的视角来回答源自“实践”的中国之问,深植本土的问题意识与文明根基。其中,如何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民众谋幸福已成为新时期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亦是我国社会工作必须回应的重要“理论”问题。正如张翼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创造了时代机遇。^①若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旨归,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和革新必然要打破以服务弱势群体为导向的“西方化”理论思维,从本土丰富的服务与治理的双重实践经验出发。这既要求我们夯实对传统人群服务的阐释,又要拓展对新型服务场域,如数字社会、老龄化社区等的认知,还要提炼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在中国本土情境中服务与治理的具体面向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我们将“服务-治理”的互构关系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性实践中进行考察,旨在实现双重理论自觉:其一是试图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具体学理表达;其二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范式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要求我们,首先,要用新的“互构”视角去重新审视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我们不仅要看到“助人”的技术,更要解读出其中蕴含的“维系社会和谐”“修复社会关系”的治理智慧。^②其次,我们要敏锐地洞察数字社会、老龄化社区等前沿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并积极探索“服务与治理互构”的多样形态。最终,我们要通过讲述这些“在服务中寻找治理故事,在治理中感受服务温度”的中国叙事,完成知识的升华。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是一条根植于实践、在“服务”与“治理”的辩证互构中生成知识的道路。理论的创新并非书斋里的冥思苦想,而是源于对脚下丰富实践的深刻洞察与系统性提炼。

在“服务+治理”双重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一方面要回应以“人”为中心的服务逻辑及其成效问题,另一方面要回应以“场”为核心的治理技术及其效能问题。这里所说的“场”不仅指西方社会工作强调的静态的“服务场”,更是指我国社会工作赖以展开的、流动而充满张力的“时代场”以及嵌入服务对象世界的“生活场”,这个“场”是与“人”相互定义、相互构成的本体,是“场域中的人”,甚至是“人与场域的合一”的实践本体。因此,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与治理的双重实践要求其在理论层面应当深切关怀并自主反思“人”与“场”的交互关系如何形塑了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新职能新作为,从而在学理上确立我国社会工作既回应个体需求也维系社会秩序的“双重属性”。

(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建构富有文化根基的自觉理论

作为一门助人专业,社会工作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各类“服务”实践,处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③因此,当前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建构主要从“服务”实践出发,聚焦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探讨如何使用专业的方法为他们纾困解难,助其融入社会,并逐步地发展出一套以实践为导向、以服务为目标的应用型理论,即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这一西式的工作理论建构过程与西方的科学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紧密相连,十分强调价值伦理的普遍性、服务过程的科学性、服务程序的标准化、服务关系的边界感以及服务对象的权能感。虽然这些西式理论对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和应用价值,但它们的概念体系、解释框架、核心命题、价值取向、方法路径等在落地中国具体情境时,与我国本土特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体制机制及源于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惯习之间发生冲突而形成理论张力。这

① 张翼:《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取得新突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0月22日,第5版。

② 童敏、李诗雨:《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社会工作》2024年第3期,第1—24+151—153页。

③ 陈海萍:《科学理性抑或回归日常?——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迷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123—139页。

种“文化惯习”作为一种内化于社会互动的实践逻辑,深刻塑造了中国社会中关于“助人”与“治理”的默认规则与价值排序——它更注重在差序格局中以自我为中心、基于身份基础进行亲疏有别的行为选择,强调在多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维系和谐,并习惯于在以家国主义为背景的行政主导框架内寻求问题解决。^①西方理论中基于权利本位、倡导明确专业边界乃至经常采用“对抗式增权”对抗国家体制、表达集体诉求的实践取向,显然与中国以关系为导向、以伦理为本、强调秩序与整合的社会格格不入。^②

基于此,考虑到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简单移植到中国本土恐有“橘化为枳”之虞,国内许多学者倡导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行动伦理融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框架中,以一种文化自觉的理念自主地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工作理论。这种立足本土实践的“文明互鉴”,正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实现从“专业移植”到“理论生成”的范式转变。当前,我们应该更加考虑在“中”的立场上解释“外”,“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③。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而这些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和传统智慧为系统梳理和自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而言,我们要在本土实践中,敏锐地发现西方理论在中国“场”域中的不适应处,通常是“人-场”“理-情”的失衡点。接着,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儒释道等)中,寻找能够平衡这种张力的概念和思想资源。^④然后,将这些中国智慧与西方理论进行碰撞、对话和融合,创造出的一套新的、能够准确描述和指导中国实践的概念、话语和理论模型。^⑤最终,将这些散点的“翻译成果”系统化,构建成一个既能解释中国实践又能与世界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这正是语缘性特色的生产过程。^⑥

费孝通的“从实求知”不仅是田野调查,更是把握“时代之实”,其学术始终回应“如何科学认识中国、如何解释世界、如何实现文明共存”的根本之问。^⑦这一思想特质,正与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相契合,因此社会工作的理论关怀在本质上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从这个意义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一直蕴含着丰富的类社会工作的“爱人”精神和“助人”智慧。例如,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佛教的慈悲精神、道教的生态智慧与西方社会工作所强调的人的福祉、社会公正及“人在环境中”等价值理念有着天然的人类文明共通性。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正是“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的生动实践。它绝非复古,而是旨在激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契合性力量。^⑧但是,由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深受其特定的现代民主进程和科学主义理念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理解“人”的问题和回应“人”的需求方面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取向和技术理性追求,这导致当其运用于注重家庭本位、情义伦理与关系网络的中国本土情境时,容易出现“理”与“情”不兼容的情况。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个人始终处于以家庭关系为中心、以情义伦理为纽带的集体网络中,所以,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人”的问题个体化,也很难单靠专业的处方来处置“人”的需

① 周雪光:《“差序格局”: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与阐释》,《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4期,第136—157页。

② 马凤芝、陈海萍:《基于时空视角的健康老龄化与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建设》2020年第1期,第3—15页。

③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16页。

④ 梁永佳:《为什么要用中国古代思想释译域外世界》,《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22—29页。

⑤ 梁永佳:《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0页。

⑥ 谢立中:《试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及其建构》,《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第1—22页。

⑦ 李友梅:《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终极问题与路径探索》,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北京,2025年11月22日。

⑧ 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逻辑——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然建构与应然方向》,《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第23—46+226—227页。

求。因此,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和拓展,首先应当有意识地将“人”置于种种具有伦理性的“关系”中(如亲亲、尊尊、长长),进而探讨如何以“仁”为根本、以“礼”为规范来理解“人”的问题并回应“人”的需求。

当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回到“关系”而非“技术”时,它的实践指向就已超出了西方传统的服务人群和专业边界,并将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治理”思维带入本土理论建构的视野。它不再仅仅关注如何通过服务和治理的互构来“理解人、治理人、塑造人”,而是最终指向“成就人”——即助力个体生成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整体性关系,实现其人格的完善与生命的价值。在这一以关系为核心的语境中,治理的本质可被视为主体在修身基础上,对人与其自身、他者、社会乃至宇宙之间的关系的积极重构与动态调适。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与治理的双重实践的本质应是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中“人”与“场”交互融合的同—关系建构过程。因此,未来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治理建构有必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行动伦理,对如何通过重构中国人的伦理关系来解决中国人的需求,做更具文化敏感性的阐释。例如,上文所提及的区域服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工作的空间性治理,即通过建构一个支持性的“附近”场域,为个体的“修身”与家庭的“齐和”创造社会条件,以期增强人们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联结,而这些实践需要我们汲取中国传统智慧对其做进一步的理论提炼。

(三)系统提炼新时代社会工作实践成果,创新体现实践导向的自觉理论

不管是建构历史自觉还是文化自觉的本土理论,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想要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框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际,从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出发,对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进行提炼和创新。从根本上说,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自主性建构和发展,其根本动力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文明形态的实践召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聚焦于“服务弱势群体”,其价值内核与方法体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中国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然而,随着中国迈入全面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与实践场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我国社会工作在“社会”领域的实践空间日益拓展,它不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与社会裂痕的“修复工具”,更被赋予了参与构建社会基层治理新格局、凝聚社会团结力量的“建构性职能”。在这一宏观现实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应当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议题,使其成为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的现实根基。其中,作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社会治理既是社会工作需要积极参与的重要实践领域,也是其必须着力深思的关键理论问题。因此,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必须超越对西方理论的“适配性”纠葛,转向对本土实践的“引领性”建构。我国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既要在理论层面回答清楚“如何拓展服务”的问题,也要结合当下实践总结创新“如何助力善治”的问题,还要立足服务与治理互构的视角厘清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显然,我国社会工作在“服务+治理”的双重实践过程中,已经为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和自主拓展指引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发展道路。这一路径与项飙所倡导的“双循环模型”深度契合:所谓“小循环”,强调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与理论提炼;“大循环”则主张学者与公众、社会展开广泛对话,让研究“为公众”“对社会”,使学术成果真正“掌握群众”,转化为社会力量。^①在这一双向循环的视野下,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治理建构或许可以围绕着前文所述的社会工作在治理实践中的新作为——从人群帮

^① 项飙:《社会研究的双循环模式——在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北京,2025年11月22日。

扶的专业作为到党建引领的专业助力,展开更切实的分析和更深入的阐释。

第一,在人群帮扶的专业作为方面,我国社会工作服务除了面向传统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开展专业服务,还要为新时期涌现的、具有新型弱势特征或处于弱势地位的各类人群提供专业支持。这就要求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必须结合新的社会治理情境(如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面对新兴服务人群(如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典型特征、核心需求、干预模型、介入策略等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提升本土社会工作在回应新的服务人群的需求时的专业胜任力和实践敏感度。在这个维度的专业作为方面,服务与治理相辅相成。同时,个体的困境常常与家庭、社区、政策等系统性问题紧密交织,我们应该从个体和环境两个方面进行介入。一方面对个体进行“内生赋能”,核心在于激发其参与现实生活、主动寻求成长的内驱力。这不仅是要使服务对象适应环境,更是激发其“自力更生”的韧性,使其在人与环境的交错影响中,获得更清晰的自我认知、更有效的环境互动能力,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性改变^①,这与中国的“自强不息”精神契合;另一方面对环境进行“关系赋能”,在这过程中,我们不能将家庭、社区视为背景,而是视为干预的核心对象。工作方法是调动“家文化”的力量,修复家庭支持网络,链接社区资源,为个体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生活场”。从治理效能看,每一次帮扶一个弱势个体,都是在微观服务实践上预防了一个家庭陷入绝境,减少了一个潜在的社会矛盾点。因此,人群帮扶的专业作为,本质上就是通过最具体的服务行动,执行着最微观、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功能。

第二,在基层治理的专业参与方面,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已经超越辅助性角色,成为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其建立信任、促进沟通、修复关系的专业能力,将潜在的对抗性冲突转化为可协商的公共议题,在化解个体矛盾的同时,有效修复基层的社会纽带,实现“化讼止争”的社会治理古训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实践。这一参与方式,与中国基层政权处理“生活小事”的机制高度契合。首先,社会工作服务在参与社区更新、环境整治等事务时,通过组织协商议事、搭建对话平台,精准对接民众在“衣食住行”中的现实诉求,在“利益惠及”中与民众建立联系。其次,凭借其贴近民众、注重关系建立的专业特质,社会工作者能够深入民众日常生活,在情感层面实现与群众的共鸣,为治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最后,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常态化走访与个案跟进,逐个解决民众的具体生活诉求,尝试将更分散的、个性化的需求推动形成公共意志,实现治理效能的持续扩张。^②这些生动实践表明,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在微观层面修复社会纽带、化解个体矛盾,实现了服务与治理的深度融合。然而,目前这些因地制宜的实践经验主要以一种碎片化、局部性、分散型的知识形态呈现,未能系统性地反哺理论,因而亟须在理论层面面对它们进行解构和统合,做到“技术理性”与“政治行政理性”的互补^③,以形成更具整体性和更有包容性的一般性知识,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学理上的指引。

第三,在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方面,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边界已然超出西方社会工作将政权与社会之间进行划定的严格常规边界,转而对特定区域进行全域性、生态性的专业深耕。其核心在于将专业服务融于日常生活之中,使现代社群重现传统熟人关系,通过本土社会工作“情理并重”的嵌入策略,为广民众营造治理和谐、合和共生的“附近”生态,进而有效提升他们的生活福祉和生命质量。我国社会工作所开展的区域服务非常具有本土特色,“服务-治理”的互构关系

① 童敏、周晓彤:《作为方法论的生活:基层治理下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的可行框架》,《河北学刊》2025年第2期,第53—60页。

② 包涵川:《“生活小事”: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兼论政权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第195—202页。

③ 郭伟和:《党建引领与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社会工作》2025年第4期,第47页。

展现得尤为系统和深刻。^①这种互构并非简单的协作,而是通过专业服务的深度嵌入,触发区域治理系统的结构性优化,其过程与结果直接滋养着本土理论的生成。正如李培林以费孝通为例,说明其研究始终源于田野、归于实践:“江村”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与村民对话、激发其历史主体意识的文本。^②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本质上是将“服务逻辑”系统性注入“治理架构”。当专业社工以乡镇社工站等形式,成建制地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时,它便超越了项目化服务的短期性与碎片化。^③这意味着,专业的“需求评估”成为区域公共决策的科学依据;“个案管理”与“社区发展”成为化解基层矛盾、激发社区活力的常态化机制。“区域发展模式”总结自基层实践,又反哺于政策与地方发展。^④在此,服务成为精细化治理的“驱动轮”,其专业过程本身就是在执行源头预防、关系调适和资本培育等治理功能,实现了“服务即治理”的深层互构。这一深刻互构的实践模式,无疑为从中国传统“家国同构”思想中汲取理论灵感、探索“修齐治平”智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四,在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方面,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是新时代志愿服务的重要模式,是观察“服务-治理”互构关系的一个绝佳窗口,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工作特色理论体系的建构。这种互构与建构过程,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实践层面,志愿服务的专业化过程本身就是服务与治理的深度融合。当志愿服务从自发、零散的“好人好事”,通过党建引领和专业社工的引导,升级为有组织、有项目、有评估的“品牌服务”时,它便实现了从单纯利他性服务向系统性社会治理的跨越。^⑤其次,在文化层面,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生长的沃土。梁永佳批评了将文化视为静态、纯粹实体的倾向,本研究恰恰与之相反,它并非要从古籍中寻找到一个“本真”中国,而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如“家国同构”“情理法”)如何在当代具体的治理与服务实践中被激活、被调适、被重构^⑥,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现实^⑦。最后,在理论层面,它通过对志愿服务中“情理法”交融的本土智慧进行总结,对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等创新机制进行理论化,这种从“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文化智慧,本身就是动态和混杂的,从而天然地规避了本质化的风险,因此我们正在生成一套能够准确解释并高效指导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回答了“如何拓展服务”,更回答了“如何助力善治”。但相关理论对这一实践模式的阐释、论证和提炼不足,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党建引领、社工护航”的志愿服务背后的价值理念、协同机制、行动逻辑等关键问题展开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尤其要注意其与西方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志愿服务的区别。

第五,在党建引领的专业助力方面,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必须深刻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助力党和政府知民意、集民智、聚民心、促民生。党建引领本质是在实践层面将党的组织优势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进行结构性融合,形成一种更具效能的新兴实践范式。党建引领为专业服务注入了强

① 高丽、徐选国:《从技术移植到本土融合: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实践的情境变迁及其深层意涵》,《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148—160页。

② 李培林:《从“江村”到“中国式现代化”:费孝通社区研究中的“原型”与“类型”及其当代启示》,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北京,2025年11月22日。

③ 童敏、李诗雨:《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社会工作》2024年第3期,第1—24+151—153页。

④ 李培林:《从“江村”到“中国式现代化”:费孝通社区研究中的“原型”与“类型”及其当代启示》,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北京,2025年11月22日。

⑤ 黄晓星:《制度联结: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多重实践与逻辑》,《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第131—143页。

⑥ 梁永佳:《超越社会科学的“中西二分”》,《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第67—80+7页。

⑦ 梁永佳:《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0页。

大的“治理功能与政治引领力”。^①当服务被置于党建的引领下,它便被整合进一个庞大的组织动员与资源协调网络,专业助力使党的治理目标实现了“服务的软着陆”。党组织的治理目标,如社区和谐、民心凝聚,若仅通过行政指令推行,往往效果生硬。而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等专业理念与方法,可以将宏大的治理目标转化为具体、人性化的服务行动。^②二者结合在实践中催生了“服务即治理,治理即服务”的自觉意识。党建引领下的专业社工,不再将自己视为单纯的服务提供者,而是自觉成为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专业桥梁”;而基层党组织也借助专业力量,将群众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暖。这种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模式及其深层理念正呼应了周飞舟所阐释的费孝通思想,即“心之所在,就是田野所在”,它要求实践者“将心比心”,与家国命运融为一体^③,而这正是“服务-治理”双重实践最深刻的体现,在精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筑牢国家治理的微观根基。因此,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和拓展应当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透过历史的视角对党的群众工作经验及其与本土社会工作的融合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从而为我国社会工作“服务+治理”的双重实践提供独特的中国视角。

五、结 论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服务”为核心导向的阐释体系。这套体系最初通过对标医学、心理学等成熟专业,以确立社会工作的科学身份与专业边界,其理论建构始终沿着“识别问题-分析成因-设计干预-评估成效”的线性逻辑展开。无论是关注个体心理动力的病理学实践、批判社会结构不公的社会与结构实践,还是强调系统互动的生态增能实践,其最终落脚点均在于解决个体面临的问题、提升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一理论传统深植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社会福利制度背景,具有鲜明的技术理性色彩,并强调专业的标准化与伦理的普遍性。然而,当其置身于中国强调“家国同构”“情理法”交融与“差序格局”关系伦理的社会文化土壤,以及党政主导、注重整合与秩序的社会治理体制时,便显现出解释力与适应性的局限。其将“服务”与“治理”相对割裂、侧重个体权能而弱化系统联结的思维框架,难以充分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于通过专业实践同时纾解个体困境、修复社会关系、参与基层善治的复合性要求。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自主发展,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拒斥,而是在深刻反思其文化预设与功能边界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治理情境与文明传统所进行的范式重构与路径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本土情境下的社会工作的本质是“服务”与“治理”的互构。开展“服务”与“治理”的双重实践,是从“拓展服务”与“助力善治”这两个目标入手。“拓展服务”是对“服务”的中国特色阐释。“拓展服务”不是数量和领域的扩大,更是服务内涵与方式的深化。其一,从“个体”拓展到“场域”。服务不仅是解决个人问题,更是通过建设“和睦的家庭场”“互助的社区场”来滋养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其二,从“理性干预”拓展到“情理共鸣”。最好的服务是既能提供专业方案,又能与服务对象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④,做到“心安理得”。“助力善治”是对“治理”的中国特色阐释。“善治”在中国的语境下,是“情、理、法”的统一。^⑤第一,服务实现“情治”。社会工作通过其

① 郭明仁、陈义双、张意:《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与服务的路径》,《中国社会工作》2025年第9期,第18—20页。

② 吴涛:《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价值取向的多维探析》,《理论视野》2025年第6期,第85—90页。

③ 周飞舟:《从田野调查到文化自觉——在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北京,2025年11月22日。

④ 童敏、李诗雨:《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社会工作》2024年第3期,第1—24+151—153页。

⑤ 梁永佳:《超越社会科学的“中西二分”》,《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第67—80页。

充满“人情味”的服务,弥补了行政手段的“刚性”,实现了社会的“柔性治理”或“情义治理”^①,增强了社会的温暖度和凝聚力。第二,服务贡献“理治”。社会工作将科学的“理性”(需求评估、项目化管理)带入基层治理,使治理决策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在中国的语境下,服务与治理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工具性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服务即治理,每一次专业的服务,都是在微观层面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这就是“治理”的实现;治理即服务,宏观的治理体系本质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递送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公平的支撑环境。

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和革新应当立足我国服务与治理互构的现实情境,兼顾历史性与现实性、世界性与本土性,以一种“立足文化、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构建起理论与实践一体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着力关注中国经验向外推演与书写表达的意义,真正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自主生产”。其方向在于深度挖掘转化中国实践文化智慧,以兼容并包的姿势对本土原创实践进行学理化提炼,宣传标识性的社会工作概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为世界社会工作贡献中国智慧,实现“既反求诸己,又胸怀天下”。

The Co-construction of Service and Governance: A New Direction in Build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hinese Social Work

Yao Jinzhong, Chen Haipi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posing new challenges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ression of its professional functions. Traditional service-oriented theories of social work are increasingly limited in their explanatory and practical capacities when addressing emerging issu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Chinese social work and its governance context, the dual mission of “service + governance” in the new period can be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into five key functional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target groups, professional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embedding in regional services, professional optimiz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guided by Party-building initiatives. Within China’s unique social contex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theory must respond to a fundamental question: how can social work achieve value alignment and action coherence across the dual practices of “service” and “governance”? Only by articulating this clearly can social work fulfill its new mission and demonstrate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izing in this field must balance historical depth with practical needs, integrate a global perspective with local foundations, and adopt an open stance of “rooted in culture,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 and oriented toward the future”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at deeply integr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Guided by the interactive and co-constructive logic linking service and governance,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social work theoretical system can proceed along three complementary paths: 1) adopt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cultivate theoretically self-aware scholarship with historical depth; 2) drawing on the wisdom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construct culturally grounded theoretical awareness; and 3) systematically refining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o innovate practice-oriented theoretical awareness.

Keywords: Social Work; Service; Governanc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张栋豪】

^① 郑廷娇、王传飞、章文光:《刚抑或柔:乡村治理中村委会的行动策略选择——一项双案例比较分析》,《行政论坛》2025年第5期,第64—73页。